

在实践中求希望：晚清留美学生的学习、实践与爱国精神

谭瑞杰

(中国铁道博物馆, 北京 100081)

摘要: 晚清早期留美学生的派遣, 是多方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后世多为其中途而废感到惋惜, 但是事实上, 这场留美学生运动并不是全然失败。这些留美学生在回国后, 尽管也曾遭遇一系列的不如意, 但是, 基本上都迅速适应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 并积极投身于具体实践, 以在美国所学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报效祖国, 作出巨大贡献, 赢得了中外一致的赞扬。之所以能够做到此点, 从根本上讲, 都是与留美学生始终如一的爱国精神密不可分的。文章从留美学生的派遣目的、学习及其问题、归国后实践与抱负等方面入手, 拟从留美学生的爱国精神角度, 对之进行一种尝试性考察。

关键词: 晚清; 留美; 爱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395 (2023) 03-0000-00

收稿日期: 2022-04-20

作者简介: 谭瑞杰(1982-), 女, 馆员, 主要从事中国铁路发展史、中国铁路文物征集与保护、中国铁路文物的数字化建设研究。

从1872年至1881年, 为了向西方学习近代化的科学技术, 在容闳的建议下, 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呼吁下, 晚清政府先后四次向美国派出了120名幼童留学。其中, 就包括詹天佑、邝景扬、梁敦彦、唐绍仪、欧阳赓、丁崇吉等人。这些留美学生, 在归国后, 对当时的政治、外交、工商、矿业、铁路等方面, 都作出重大贡献。

对于相关问题, 自从美国学者拉法吉在1942年出版《中国留美幼童史》以来, 国内学者纷纷跟上, 成果纷呈。其中, 尤其是对詹天佑、唐绍仪、梁诚等人的研究, 学界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大致来说, 相关研究可分4类:

1. 从近代化角度, 分析晚清政府派遣留美学生的历史意义。例如,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一文, 将1872年的留美学生作为“近代中国较有规模的官费留学运动的开端”。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1872—1949》一书, 将留美学生称之为“孤独的先行者”。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一书, 将留美学生视作“晚清中国现代化启动的一项重要步骤”。

2. 对派遣留美学生背后相关问题的考察, 尤其是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官派留美学生事件中的努力, 并将其放置在洋务运动的整体中来考察。例如,

王希莲、张礼恒《李鸿章与中国首批留美学生》一文, 专门考察了李鸿章对留美学生的支持举措。孙崇文《清末官费留学生政策之考察》一文, 复原了官派留美学生较为完整的制度设计。李忠《新世纪的曙光—晚清新式教育活动研究(1840—1911)》一书, 强调了留美学生计划是曾、李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一环。

3. 对晚清政府突然中止留美学生派遣的原因分析。例如, 潘向明的《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一文, 认为是容闳本身的性格缺陷导致其与吴子登矛盾激化。李志茗的《“留学界之大敌”吴嘉善的再评价—兼析容闳与吴嘉善之冲突》一文, 认为对整个留学事宜缺乏系统周密的部署是其半途而废的最主要原因。

4. 对留美学生的近代化贡献与个案研究。例如, 王善中《近代中国首批留美幼童的成就及其意义》一文, 对留美学生的职业成就作了系统总结。茆诗珍、徐飞两人则在一系列论文中, 重点从科技史角度考察了留美学生归国后的历史贡献。

这些研究成果, 对于了解早期留美学生的问题, 都起到重要作用, 也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然而, 学界对于早期留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内在的意识领域, 关注尚少。鉴于此, 笔者不揣

鄙陋，拟从留美学生的爱国精神角度，对之进行一种尝试性考察。

一、各方联合派遣留美学生的最初目的

如果想要深入考察早期留美学生日后的爱国精神，必须先要了解各方联合派遣其出洋的目的。因为只有将最初目的与其日后的实践表现相参照分析，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其是否违背初心。

（一）容闳的追求

早期留美学生的派遣离不开容闳的倡议、发起之功。近代教育家舒新城即言：“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1]那么，容闳为何如此亟亟于留美学生的派遣呢？答案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接受了耶鲁大学高等教育的广东人容闳，一方面见识了西方社会制度的发达、国力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国自身的腐朽落后，以及严重的民族危机。因此，他迫切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效法西方来改变中国。对此，容闳在其撰写的《西学东渐记》中，便曾表述称：“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怀……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2]

（二）曾、李的目标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实践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外在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距。所以，他们更迫切的想要向西方学习，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因此，在奏派留美学生的奏折中，曾、李两人便明确表述称：“拟选聪颖学生，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3]¹⁵³

（三）晚清政府的期望

作为留美学生派遣运动的最终决策者和资助人，晚清政府的目标更为明确，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点在光绪六年（1880），有人奏称留美学生多信奉基督教，留学监督区谔良管理松散时，光绪帝即谕称：“朝廷不惜重帑，设

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学生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才，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4]

（四）留学监督的管理

作为留学监督的陈兰彬、吴嘉善等人，因为其反对留美学生自行剪辫、改穿西装、学习跳舞等行为，而一直被视为保守顽固的代表。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容闳第一次见陈兰彬后，便记载称：“其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5]¹²⁶显然，陈兰彬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赴美之后，两人因思想认识上的差异而渐生裂痕，但容闳对陈兰彬人品仍未予攻击，只是认为其“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5]¹³⁷。

吴嘉善在其就任仪式上，因为留学学生不下跪而勃然大怒，认为他们“适异忘本，目无师长”。稍后，其又多次向李鸿章称：“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最终，因为这些言行，吴嘉善被容闳称为留学界之大敌。事实上，吴嘉善并非迂腐守旧之人。早在京师任职期间，其便曾“忧世变日亟，非知彼知己无以御侮自强，因从英法教士习语文，能读英法二国原本书，博通西洋史地及数理之学”^[6]。

一个是被容闳称为品行端正无邪之人，一个是因为要御侮自强而自学西学之人，并且，两人皆是进士出身，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那么，对两人的“反常”表现，便不能以一句简单的顽固保守而评价。

事实上，如果换一种角度，亦可以从陈兰彬、吴嘉善两人的表现中，探寻到其作为官方代表对留学事宜的态度，以及作为个人对留学事宜的期望。他们并非希望留美学生都不学无术，最终都一事无成，他们只是因为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一时间无法接受西方的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他们害怕因为这些陌生的东西而影响到留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而背离了清政府派遣学生留学美国的最初设想，既辜负了朝廷

的殷切期望,也难以对曾、李等人交差。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这些学生能够苦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将来称为可以报效朝廷的有才之士;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继续使用封建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来管理、约束这些留美学生,以防他们叛经离道。显然,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两人便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二、留美学生的学习及其问题

留美学生在美期间的学习都比较刻苦,成绩亦非常优良。耶鲁大学校长朴德(Noah Porter)就曾致信总理衙门称:“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7]

对此,李鸿章亦表示了同样的肯定态度。其在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初三日便曾奏称:“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迭经面加校试,考其所学。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其分赴各营教习者,于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3]167}

就此而言,清王朝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最初目标是成功的。然而,这些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军事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社会制度、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其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产生了裂痕。突出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学生不再习惯于穿着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而是改穿西装领带,对脑后拖着长长的鞭子也不再满意,私自剪掉,等到拜见留学监督时,再装上一根假辫子。而辫子的存留问题在当时中国绝非小事。从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戊戌变法之际,慈禧太后告戒光绪帝“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辫子的存留已经被长期视为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牵涉到对于传统礼教的认可与接受,及对清王朝忠心与否的问题。所以,当

发现留美学生私自剪辫的问题后,吴嘉善才会气急败坏地怒斥学生,并向朝廷举报称:这些学生将来即使成才,“亦不能为中国用”。当然,其后留美学生被撤回国后的一系列实践表现,证明了吴嘉善的杞人忧天。然而,无论如何,设身处地,在当时情形下,在陈兰彬、吴嘉善等人看来,留学学生们的一系列反常表现,的确是已经离经叛道,出现了难以掌控的趋势。

三、留美学生的归国、实践与抱负

1881年,由于中外各方面的因素,留美学生被全部撤回。回到国内后的留美学生们,下船伊始,便感受到了强烈的中外差异。

作为首批留美学生之一的温秉忠曾回忆称:“曾幻想有热烈地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呐,全成泡影!”^[2]

另一学生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巴特拉夫人的信中,亦写道:我们“被独轮车装载着前往海关道台。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腐烂潮湿。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8]

不仅官方对其的迎接招待令人失望,整个社会舆论对于归国的留美学生们似乎也缺乏善意。当时的《申报》便报道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9]

随后，清政府又对这些归国的留美学生们进行了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安排。其中，分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的7人，分到大沽口炮台鱼雷艇队工作的6人^[10]；分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职的16人^{[11]437}，另有6人进入天津海军医学校（北洋医学堂）^{[11]449}。因为当时政府负责的官员大多不懂近代西方的教育体系，所以，在安排留美学生工作时，“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员来决定。”^[8]造成他们学非所用。例如，詹天佑在耶鲁大学学的是铁路工程，却被分到广东博学馆教书，后又派到黄埔水陆学堂教英文。欧阳庚在耶鲁大学学的是机械工业，却被任命为旧金山等地领事。这样的人才浪费，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背离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初衷。所以，一位留美学生后来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当年我们由美回华，实感遗憾。可是，即使我们学成归国，在那个时代，也不许可我们有所作为。”^[8]

这些留美学生尽管有些不满，但是，仍然忠于职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努力，作出巨大贡献。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担任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等佼佼者自不待言，其余诸人亦先后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例如：

周万鹏，曾历任上海电报总局会办、提调、总办、邮传部技术监督。他将西方各国的电报政策、技术规范章程予以搜集编纂为《万国电报通例》，在全国颁行使用，对中国电报技术的规范化和与国际接轨作出重要贡献。

邝荣光，曾任直隶省各煤矿工程师多年。詹天佑主持修筑京张铁路时，曾在开凿山洞问题上受阻。邝荣光时任山西临城煤矿总工程师，便将丰富的煤矿开采经验用于山西临城煤矿。1905年，他调任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后，通过实地踏勘绘制出《直隶地质图》《直隶矿产图》和《直隶石层古迹图》三份重要图件，为近代中国矿业、地质与古生物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因故未能走向科技领域的留美学生，亦努力进取，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1904年至1906年的中英西藏问题谈判中，唐绍仪纵横捭阖，始终不忘立场，最终迫使英国“允不占西藏境及不干涉西藏的一切政治”^[12]。

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俄蒙协约》。11月7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如浩向沙俄提出抗议：“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3]

另外的一些留美学生，甚至为国家、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在归国的留美学生中，有50余名先后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海军建设。仅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就有4人牺牲，即薛有福、杨兆南、黄季良、邝咏钟^{[14]308}。

这些参战留美学生的英勇表现，征服了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 Young），在其1884年9月2日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便提到道：“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杨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该学生共计五名，点放炮位，甚为合法，极其灵巧，均系奋不顾身……本大臣接阅之余，实深钦佩，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见其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是该学生等，上足以仰副贵国之栽培，下足以特表一时之英俊，安见其难为有用耶？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

同年12月12日，在致美国国务卿佛林休生（Frelinghusen）的报告中，杨约翰再次提到留美学生的英勇表现：“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现在中国政府服务者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在此次福州事件中，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祖国作出重大的贡献。”^{[14]123}

其后，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留美学生再度表现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作为舰长的吴敬荣（广甲舰）、容良（环泰舰），帮带大副的沈寿昌、陈金揆、宋文翔、黄祖莲，枪炮大副的曹嘉祥、徐振鹏，作战参谋的吴应科，鱼雷队长的王良登、蔡廷干等人，沉着冷静，不避艰险，恪尽职守，痛击日寇。最终，有3人阵亡殉国，即济远号大副沈寿昌、致远号陈金揆中校，及广丙号大副黄祖莲。

作为曾经以外籍顾问身份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国海军中尉泰勒(William F. Tyler),在时隔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称:“当我回忆吴(应科)及曹(嘉祥)引导我参观他们旗舰时,他们的学识能力均令我十分钦佩。”“他们是优秀的军官,李(泰曾)中校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吴(应科)上尉参谋,外号叫鹤鸟的美国留学生及沈、高两上尉……无论由任何方面讲,他们均是优秀的军官。”^{[14][26]}

四、爱国与忠君:留美学生的转变和分化

留美学生尽管大多所学为近代科学技术专业,归国后也基本上是在科技工程行业任职,很少参与政治(见表1),但是,他们并非不关心政治。恰恰相反,他们的政治态度非常复杂,甚至多变。例如,梁敦彦赞同共和,却又拥护皇帝;拥护皇帝,却又反对袁世凯复辟;反对袁世凯复辟,却又支持溥仪复辟。

表1 留美学生归国后职业统计表

职业或其他情况	人数
国务总理	1
外交	16
海军	16
税务	1
海关	2
教师	3
铁路	14
矿业	9
军医	4
政界	3
电信	16
经商	8
医生	3
律师	1
报界	2
在美病逝	3
不详	4

资料来源: Thomas Lafargue.《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高宗鲁译注,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第75页。

如果以时间为线,可以发现,这些留美学生在

归国后的政治态度曾经发生了至少4次重大转变。

1. 清朝灭亡以前。这些留美学生从不适应、不满意,到积极参与具体事务,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这一时期,也是留美学生迅速成长的阶段,他们将在美国所学知识、技能迅速融入到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在各行各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

2. 清朝灭亡时。这些留学生虽然对清王朝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但是,面对日益腐朽的清王朝,他们又在内心深处赞同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所以,他们对于袁世凯等人逼迫宣统皇帝退位的事情并无太多的反对意见,基本上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

3. 1916年。尽管唐绍仪、梁敦彦等人一度支持袁世凯开创民国,但是,当袁世凯表露出复辟称帝野心后,这些留美学生尽管都与袁世凯曾经有过深厚交谊,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15]。

4. 1917年张勋复辟时。在这次复辟过程中,留美学生开始产生分化,大多数人对于复辟已经不抱希望,所以,更不会参与其中。但是,亦有少数例外,如梁敦彦便曾参与复辟,并在复辟中担任外务部尚书,后又在1922年溥仪大婚中,担任总招待,成为著名的复辟人物。

如何理解留美学生的这些转变呢?笔者以为,中西方的文化本质和核心,有共性也存在着差异化。人通过劳动实践将自身确立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世界。接受了美式教育的留学生们,在美期间和归国之初曾经感受到中西差异,只是暂时带给了他们迷茫困惑,不久之后,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他们便很快给自己找到了准确的定位,并找到了调和中外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

1. 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在爱国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留美学生都是保持了一致的,没有任何一个在后来成为汉奸、国贼。当清王朝存在的时候,他们或钻研技术,从事工程;或奉命出使,纵横捭阖;或投身海军,以身报国,都是积极爱国的表现。

2. 正视自我,继续努力向西方学习。他们能够在坦然承认自身不足的前提下,积极努力地向西方学习一切先进的事务。1906年3月24日,詹天佑

在致美国友人毕奇洛（Bigelow）的信中即写道：

“我一直希望再有机会到美国去，为了能学到更多的事物，特别是在铁路方面。这一方面我现有的学识不够，今天已有多么大的进步和多少发明啊！”^{[16]87}

同年10月23日，他又致信布雷肯里奇（LP. Breckenridge）教授，请其代购一些工程技术类书籍，包括约翰·亨斯克（John B Hensk）著《铁路工程师外业用书》、查尔斯·本德（Charles B. Ben-der）著《金属桥梁设计的经济原理》、查姆斯·德雷奇（James Dredge）著《宾夕法尼亚铁路》、亨利·德林克（Henrg S. Drinker）著《山洞工程、炸药和凿岩》、罗伯特·格里姆肖（Robert Grimshaw）著《蒸气机问答》、奥格斯·辛克莱（Augus Sinclair）著《蒸汽机车运行和原理》等^{[17]78}。

3. 将希望溶于实践，在实践中求希望。当留美学生归国时，晚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是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益严重。大厦将倾，一木难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束手旁观，无所事事。这些留美学生便是将各人的所学逐渐运用到各行各业的具体实践中，讷于言而敏于行，每人努力一点点，每天努力一点点，每事努力一点点，一步步竭尽全力地去影响、推动整个社会、民族由坏向好缓慢转变。

例如，时人就曾认为詹天佑不善言辞，詹天佑本人在演说中也一再强调自己“拙于言论”，“为属鄙人演说，则鄙人以演说为最难事，且以为较筑造铁路尤难也。”^{[17]22}但是，詹天佑真的是不善言辞吗？答案显然不是。1907年5月9日谒见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时，詹天佑便曾侃侃而谈，力陈尽快筑成该路有三利，打动了岑春煊，奏准将650000银两全部交给詹天佑使用，并在随后全力支持京张铁路的建设^{[16]63}。作为学习科学技术出身的留美学生，詹天佑只不过是更愿意实干救国，不屑于空谈误国罢了。

五、结语

为了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晚清政府在容闳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推动下，向美国派出了最早的留学生，希望他们学习西方的军

事，掌握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回国为巩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服务。然而，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留美学生在美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思想、风俗习惯、政治意识的影响，让清王朝感觉留学运动渐渐脱离了其预定的轨道。所以，在1881年强行撤回了所有的留美学生。尽管如此，这些留美学生依然很快适应了国内的情形，并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作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中外一致的好评。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留美运动并未失败。对此，美国学者勒法格（Thomas E. La Fargue）便说道：容闳“并没有完全失败，在为中国走向科技大道上，容闳作出的贡献，是远远超过其他人的。他的接班人——‘肄业局’的留美幼童们，在中国现代交通事业上，均居于领袖群伦的地位，他们倡导修筑铁路，开办电报，扩充煤矿。不仅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化陆军海军的第一批优秀军官。”^{[14]85}

留美学生运动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源，除了容闳的倡导、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和清王朝的肯定外，更源自留学学生们自身的爱国精神。他们大多出身东南沿海一带的贫困家庭，悲惨的底层经历和近代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的地域优势，让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他们对近代中国自身存在的弊病、严重的内忧外患，更有着一种迥异于传统士大夫的认识和急于改变近代中国的迫切意愿。所以，他们更注重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以各自所学的科学技术报国，从而在取得自身成就的同时，也一点点地促进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 [1]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 [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2.
- [2] 温秉忠. 一个留美学生的回忆 [M]. 长沙：岳麓书社，1985：267.
- [3]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4] 清实录馆.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24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779.
- [5]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6] 吴宗慈. 吴嘉善刘孚翊合传 [M]. 印本. 南昌：江西省博物馆，1985：27.

- [7] LAFARGUE T. 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M]. 高宗鲁，译注.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
- [8] 高宗鲁.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10-12.
- [9] 留美官学生归国 [N]. 申报，1881-09-29.
- [10] 容尚谦. 李喜所，译. 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 [J]. 南开史学，1984（1）：172-188.
- [11] 张侠，杨志本，罗澍伟. 清末海军史料 [M]. 北京：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 [12] 王铁崖. 中国旧章汇编：第2册 [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345.
- [13] 程道德.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8：93.
- [14] 勒法格. 中国幼童留美史 [M]. 高岩，译. 香港：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社，1980.
- [15] 何昕. 梁敦彦评传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 [16] 詹同济. 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 [M]. 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 [17] 詹同济. 詹天佑文选 [M].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姜昕]

Hope in Practice: Study, Practice and Patriotism of th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N Ruijie

(China Railway Museum,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dispatch of stud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involved many parties. Although in some way it was abandoned, it did not fail. After returning, most of the students adapted to China quickly, and actively devoted themselves to patriotic practices. The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won unanimous praise from home and abroad. Their succes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ir patriotism.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urpose of stud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learning and difficulties, their patriotic practice after returning, and tries to conduct a tentative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riotism among these student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patriotism